

尼克松借中苏冲突实施对华和解

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国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主要是19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中国土地,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形成的。苏联与中国于1924年签订协定,放弃了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当时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直到1963年3月,中国首次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问题。1964年2月25日,中苏在北京举行了边界问题的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69年3月2日,中苏于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主任乔治·丹尼于3月4日给国务卿罗杰斯写了一份情报简报,认为“(中苏)双方都可能引发事端”。丹尼指出,自1965年以来,苏联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苏联的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但“苏联不可能想(主动)攻击中国”。美国方面对当时中苏冲突实质的认识比较模糊,更倾向于中国“好战”“挑衅”的看法。然而,事实并不如丹尼预见的“近期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斗”,相反,3月15日,在珍宝岛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分析主任霍尔德里奇,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林可夫举行了次会,双方就中国和越南问题交换了看法。林可夫重申苏联的老调,说存在着中国使用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攻击苏联的威胁。霍尔德里奇则说,中国方面的说法恰恰相反,是苏联威胁对中国使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

当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是否认为中国将进攻苏联时,霍尔德里奇回答说,中国在战略上是防御性的,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并且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1966年2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主席时所讲的,中国不希望过早介入越南事务,因为有责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美国打算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否意味着美中之间不再可能发生战争。霍尔德里奇回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没有消除,但是,与有7亿多人口的中国持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次会晤是1969年3月中苏冲突后,苏联首次试探美国对中苏冲突的态度。

苏联积极探询美国的态度

中苏之间边界冲突不断,1969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文。怀廷写了一份题为《中苏战对及对中国美国的启示》的长篇报告。

1966—1969年间,苏联在靠近中苏边境地区的地面部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装备精良。怀廷分析,苏联这样做,可能的理由不外乎三种:进攻、干涉和防御。苏联显然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进攻理由,也不可能像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轻易地实行对中国的干涉,所以只能以防御作为理由,说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威胁到了苏联中亚和远东的国土安全。

苏联为何要这样做?怀廷认为,当中苏分歧越来越大,苏联越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核力量不断壮大,所以,苏联领导人迟早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中苏战争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则是双方都可能使用核武器。



尼克松在任期间,曾于1971年7月访问中国,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

因此,怀廷建议美国要尽快确立它的目标:第一,不要让苏联进攻中国的事情发生;第二,阻止任何一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第三,最大限度地使中国把苏联当成唯一的敌人。怀廷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迫切性的问题,即必须尽快与中国建立沟通的渠道。

这年八九月间,苏联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探询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实施攻击,美国会是什么态度。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达维多夫与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负责北越问题的特别助理威廉·斯蒂尔曼会面,达维多夫突然问,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怎么做。斯蒂尔曼回答说,美国一定会置身事外。这是苏联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苏联攻击中国的态度。

这时,关于中苏冲突的讨论已进入美国最高决策层。9月10日,罗杰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苏联对于中国问题正在作出抉择。9月18日,尼克松会见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罗杰斯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在座,他们谈到了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问题。基辛格表示,美国要避免给人以站在苏联一边的印象。

尼克松把中国看成世界五极之一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苏冲突的反应出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包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在内的传统的外交事务机构,对中苏冲突有很大反应,但对直接的外交决策影响有限;二是白宫系统中的基辛格班子,对中苏冲突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却是真正有决策权力的机构。尼克松和基辛格已有共识,就是要撇开政府的官僚机构,由白宫直接进行外交决策。而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中美关系的突破,正是尼克松上台之前已经定下的目标。

当总统以后,尼克松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战。解决越南战争和对付苏联,是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现实需要。此外,尼克松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忧,那就是要在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统”,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衰弱只是暂时的。

这在他1967年于《对外关系》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有所表达,尼克松呼吁让中国“作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他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五极之一。他反复强调,使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是危险的,因为10年之内,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大核国,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已经决心要在改善美中关系上有所建树。为了实施其外交战略,尼克松上台以后,立即从三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由基辛格主持内部研究,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设法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触;三是逐步放出政策气球,试探国内外的反应。

可以说,中苏关系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自从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美国就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周恩来与“铁人”王进喜的友谊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这天,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王进喜作为唯一的工人代表,荣幸地出席了毛主席的小型生日宴。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进喜是这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许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团后排。临散会前,服务员通知留下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和董加耕,周总理将四人带到一间小宴会厅,向陈毅、贺龙、董必武等领导作了介绍。

几分钟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起从西门向客厅走来。周总理安排董加耕坐在主席左边,安排邢燕子坐在主席右边。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过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饭。我的孩子不让我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话嘛!”

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王进喜与毛泽东主席同桌就餐,使得其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近距离地接触并谈话。此外,周恩来总理还曾两度邀请王进喜出席国庆招待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宴。

鼓励钻井进尺创世界纪录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据时任石油工业部党委书记的康世恩回忆:当总理到1202、1205钻井队时,听说两个队当年都要打井5万米,总理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扶刹把,给总理表演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总理高兴地边看边问:“能打多少米?”王进喜说,今年保证上5万米。总理高兴地举起双手,连声说了三个“好”。临离开钻井队时,总理又握着“铁人”王进喜的手,一再嘱咐说:“你们这两个队,今年如果都打上5万米,要告诉我。”

就在这年的9月,1202和1205钻井队钻井进尺达7万米,年底打出了10万米。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王进喜以石油报捷团团长的名义,率团进京报捷,9月29日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王进喜和报捷团成员。

安排出国并在国外同桌进餐

王进喜曾出国到阿尔巴尼亚,这次出国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据当时石油部给国务院外事办《关于我部访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增加人员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谈到,根据总理在大庆的批示,代表团出访时除执行原定的访问任务外,还需要介绍大庆油田的建设情况,“拟在代表团原有七名成员的基础上,增派大庆的政治部副主任、先进个人及家属代表各一名”。文件的附件是代表团人员名单,共计12人,王进喜名列其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5月9日用毛笔在自己的名字上做了圈阅,次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由此可见,是周恩来总理提议并亲自批准王进喜作为中国石油代表团成员出访阿尔巴尼亚的。

代表团6月2日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6月26日,在阿进行国事访问的周总理在驻阿大使馆又一次亲切会见了王进喜,并与其共进晚餐。据同访阿的大庆家属代表陶冰华回忆:“当总理一走进宴会厅,只听周总理说:‘来,来!大庆人,王铁人,坐在我这里!’于是我俩就被安排坐在总理的左边和右边了。”席间,总理和王进喜说了不少话。

逆境中的救助

1966年底,少数阴谋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蔑大庆红旗,并到处搜集铁人王进喜的黑资料,并大肆造谣、诬蔑王进喜。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67年1月8日亲自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作了义正辞严的讲话。周总理严肃的态度,对当时的恶劣势头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半个月,一小撮坏人不顾周总理的警告,公然再次掀起批斗和迫害铁人王进喜的狂潮,使他精神与肉体受到摧残。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激动。随后,很快就指派记者到大庆找到了王进喜,向他传达了周总理的问候,王进喜激动地对记者说:“请转告周总理,我王进喜没有倒下。”不久,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王进喜和其他同志。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的讲话又一次旗帜鲜明地保护了王进喜。

亲自听汇报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庆油田出现了“两降一升”(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地下含水上升)的局面,油田接连发生一些事故,原油被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身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的王进喜忧心如焚,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大庆革委会常委会上。然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70年1月,在石油部军管会召开的石油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王进喜仗义执言,将大庆油田的真实情况面陈余秋里。余秋里听后感到问题严重,指示王进喜要进一步做准备,向周总理汇报。会议期间,周总理请王进喜到南海去看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纪录片。总理边看电影边对“铁人”王进喜说:“你说的大庆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详细的情况你们准备一下,让石油部写一个报告。有时间,我邀请你们再谈一次。”

3月10日,周总理约见王进喜,详细听取了王进喜的汇报,深入了解大庆油田的情况,并于18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不要忘记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周总理的批示,给大庆油田指明了方向,广大干部工人受到鼓舞,较快地扭转了被动局面。

嘱咐发扬“铁人精神”

1970年4月,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在有关领导劝说下,赴京检查治疗。周总理得知后,亲自安排他住进总后301医院,高级医疗护理,单间病房,著名专家医师会诊。

王进喜逝世后,周总理接见了王进喜在京的全体家属,并一一询问了年龄、工作和生活情况。接见王进喜爱人王兰英和王进喜的弟弟王进时说:“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你们要坚强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把王进喜同志的精神发扬下去。”

对于纪念铁人、学习铁人精神,周总理还曾在1971年1月31日大庆革委会政治部给炼化部报送的《关于追悼和学习铁人王进喜同志活动的情况简报》上批示:“铁人是个英雄,值得纪念,铁人精神,值得学习记载。”(据《领导文萃》)

北齐北周对腐败的态度决定国运

民族矛盾和腐败,是十六国、北朝以来胡族国家的两大痼疾。北齐北周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问题,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仿佛如镜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国家的命运。

北齐纵腐败人听闻

高欢扶立东魏,儿子高洋又篡魏代齐,皇族和统治者的高层,都属鲜卑化的汉人或其他杂胡。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六镇的仓皇武夫,对物质的渴望变态到令人发指。“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如高欢的姐夫尉景,不管在中枢还是在地方州镇,都索贿成性。高欢每每提醒他不要太过分,尉景充耳不闻,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

当时贪污已成为北齐高层的普遍做法,宗室、外戚、元勋宿将,乃至后来归附高欢的河北汉人豪强,也都被这一风气沾染。可是高欢并未有效地约束东魏腐败行为,百里把纵容贪腐当成笼络人心的特殊工具。

大臣杜弼曾向高欢力陈反侧的重要性,高欢便故弄玄虚地摆出一个刀架阵,武士们举着刀、架,引着弓,让杜弼从中穿过。虽然高欢事前已向杜弼担保,武士们绝不会伤害他,杜弼走了一遭后仍然吓得汗流浃背。高欢见状大笑,说:“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虽举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刀,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欢还说,如果还于峻急地惩治,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关中的宇文泰和南朝萧衍。这番理论,当真是思路清晰。

深入肌骨的腐败,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但相对于这种短时效应,腐败的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更

无法挽回的。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惩治了一大批贪腐之徒。然而当改革触及到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反弹。尉景被逮捕监禁后,高欢的姐姐常山君来哭诉,高欢便下令把尉景无罪释放,还当着姐姐、姐夫的面打了高澄一顿。尉景却理直气壮地吐糟高欢,说要杀就快点杀。

高欢的决心似乎并不坚定,不能坚守立场,使得这场改革先天不足。后来高澄遇刺,不得不说不,与高欢态度是有一定关系。高澄死后,高洋不得不向尉景表示一定妥协,大封斛律光、尉景等一干老臣宿将,反腐败问题又被暂时搁置。

高洋因酗酒暴毙后,武帝高湛上位,“唯玩声色”。武治还牵连出北齐后期军事支柱斛律光与祖珽等人的斗争。祖珽本身就是个贪墨成性之人,甚至在高欢的酒席上偷取金银器史中丞奚泰当场拽他胡子,在他发髻里找到赃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齐后主高纬(高湛的儿子)时,祖珽大权独揽,与斛律光产生矛盾。他不知收敛,强占官府周围的百姓宅院,引发极大恶评。

高纬宠臣穆提婆想娶斛律光的女儿,被后者拒绝,穆提婆也是贪墨小人,自此与斛律光结怨。于是,祖珽和穆提婆一起构陷斛律光,加之北周又施离间计,导致斛律光被杀。

齐周皇族迎来的家风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初,就鲜少有腐败的风气。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非常推崇儒术,颁布的《六条诏书》,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养。他还通赤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535

年,宇文泰的舅舅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在州贪满天花,宇文泰直接将其处死。

与《北齐书》诸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一股清俭之风。比如王思贵为荆州刺史,素来清廉自守,颍川之战他被东魏俘虏后,家中居然一点积蓄都没有。又比如位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将军后反而非常爱惜声名,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作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全都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15个儿子,大半平庸或是暴戾。高澄十四岁便幸父之妾,高欢死后,高澄竟纳父妾柔然公主并生有一女,甚至还逼幸高洋的妻子李祖娥。高湛诸子尤不成器,高纬又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的陆令萱、穆提婆等人无一不是贪婪成性,把朝局弄的一片乌烟瘴气。高氏诸王江河日下,眼睁睁地看着北周国力反超北齐。

而宇文泰非常重视儿子女儿们的教育,其13子都完全按照汉家皇室子弟的路数,从小就学习儒学经典。除六子宇文直仅在权力上稍显暴戾外,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上良好。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五子宇文宪是名将,在北周发动战争时向国家捐献财物。第十一子宇文达吃饭不追求铺陈浪费,吃饱便行;侍姬不过数人,都只穿粗厚耐磨的缁衣。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尽管后来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但隋朝能够实现一统,跟北周打下的国力基础密不可分。(据《澎湃新闻》)

济北口腔医院

安全·舒适·高效·创新

睡眠洁牙

济南市口腔专家付晶每周三定期坐诊

0531-84238686 | 济阳区富强街11号